

中等技能劳动力收入份额空洞化

作者：Mai Dao、Mitali Das、Zsoka Koczan 和 Weicheng Lian

2017年4月14日

当今许多发达经济体中，工厂通常是如何运营的呢？已经不再需要大量工人列队站在流水装配线旁边，而只需少数工人（很可能是工程师）注视着高精尖设备的屏幕——这些设备负责装配工作，取代了过去的人工。随着技术进步不断压低资本成本，公司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代替工人完成各项工作。

这篇博客根据2017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第三章编写，第一部分讨论了技术进步和全球一体化的经济惠益，以及这些力量是如何影响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在本部分中，我们更深入地探讨发达经济体的中等技能劳动力收入份额“空洞化”现象。部门自动化程度越高，中等技能劳动力收入份额的下降幅度越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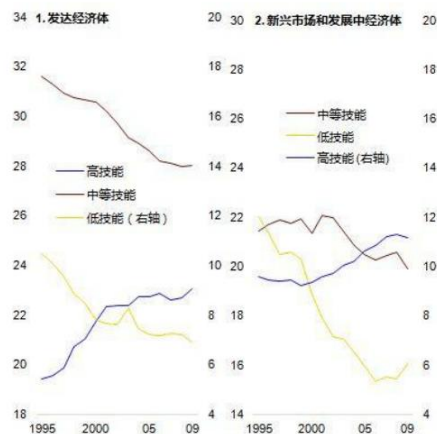
逐步消失的中间层

1995年至2009年期间，全球中低技能劳动力收入份额下降了7个百分点以上。

感受到压力

中低技能劳动力收入份额一直在下降。

(百分比)



来源：基金组织2017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

与此相比，高技能劳动力收入份额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均有所上升。一种温和的解释将这种变化归因于技能溢价的上升——它鼓励提升技能。因此，随着时间推移，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供给超过了中低技能劳动力。

例行工作不复存在

即便如此，我们发现，例行工作倾向型技术和全球一体化也在发挥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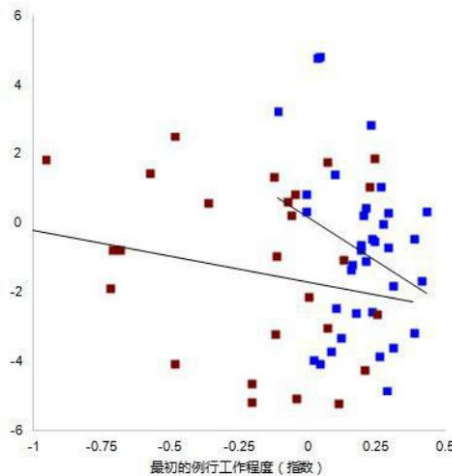
为了得出关于例行工作倾向型技术的结果，我们构建了一个新的**跨国指数**，它同时涵盖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该指数衡量有可能被自动化取代的职业的比例；技术进步以投资品价格的变化表示。

我们发现，例行化程度最初较高的国家（和部门）后来经历的劳动力收入份额下降的幅度相对较大。例如，美国和意大利的制造业部门情况都是如此。

例行工作的成本

工作的例行化程度最初越高，劳动力收入份额下降幅度越大。

（劳动力收入份额趋势，以百分比计）



来源：基金组织2017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

注：蓝色方块代表发达经济体，红色方块代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然而，原本例行工作较少的国家和部门经历的劳动力收入份额下降的幅度较小。美国餐馆和酒店的情况就是这样，因为人际互动可能不太容易受自动化趋势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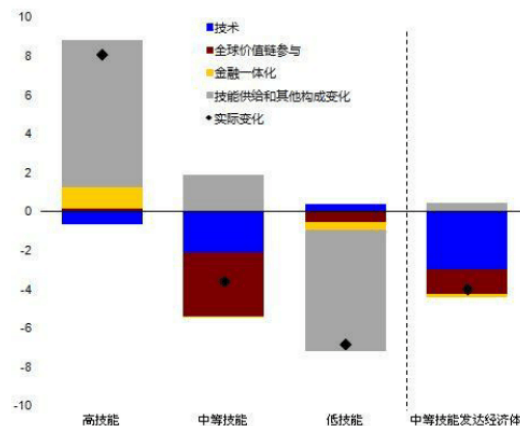
劳动力阵痛

我们的分析显示，技术和全球一体化主要是对中等技能劳动力的收入份额产生影响。分析结果符合这样一种认识：中等技能工人的工作例行化程度高，加上工作外包到境外，导致对中等技能工人的需求减少，使他们只能接受停滞不涨的工资，或者被调到低技能和低收入的职位。

相同驱动力

技术和全球一体化是中等技能劳动力收入份额下降的关键驱动力。

(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变化，以百分比计)



来源：基金组织2017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

注：从按技能分组列示的总体劳动力收入份额回归中得出分解结果。中等技能发达经济体是指仅使用回归中发达经济体子样本对中等技能劳动力收入份额进行的分解。技能供给和构成中其他变化的作用来自教育部分和回归系数的综合效应。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对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技术对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影响不那么明显。这不仅是由于这些经济体原本自动化程度低得多——这限制了例行工作倾向型技术对劳动的取代，而且是因为投资品相对价格的下跌幅度在这些经济体相对较小。

应对干扰——进一步的思考

技术进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劳动力收入份额下降的关键驱动力。不过，它们同样也是全球繁荣的引擎。政策制定者需要想明白该如何更均匀地分配它们所产生的惠益。

在发达经济体，政策应当侧重于帮助工人应对这种干扰。应当在工人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推动技能升级，同时也应制定各项政策，促进失业工人重新找到工作，降低求职和过渡成本。

基金组织博客主页：<http://blog-imfdirect.imf.org/>

还可以考虑安全网和收入支持政策，但是这些需要适应各国的具体国情。因技术而非贸易失业的工人所受的影响可能更加久远。为此，需要采取长期的再分配措施帮助他们应对。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应当汲取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教训。教育和技能深化方面的投资对于帮助工人从技术和全球一体化引发的经济转型中获益至关重要。

解决之道并非抵制创新或退出全球一体化，而是在接纳它们的同时，对它们带来的干扰和惠益筹备万全。



Mai Chi Dao 是基金组织研究部开放经济体处的经济学家。她的研究范围涵盖国际宏观和劳动经济学的广泛问题，她曾就此在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她此前曾就职于基金组织欧洲部和德国联邦银行。她拥有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以及柏林自由大学文凭。



Mitali Das 是基金组织研究部主任助理。她与他人联合主编了《对外部门报告》（2014 年、2015 年），并曾在研究部开放经济体处和多边监督处任职。此前 Das 女士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并曾在哈佛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担任学术职务。她拥有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



Zsoka Koczan 是基金组织研究部世界经济研究处的经济学家。此前她曾就职于基金组织欧洲部。在 2013 年加入基金组织之前，她曾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工作。她的研究领域包括应用微观经济学、不平等和移民。Koczan 女士拥有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



Weicheng Lian 是基金组织研究部的经济学家。此前他曾就职于基金组织欧洲部。他的研究范围包括宏观金融（侧重于住房趋势和周期），以及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变化。他拥有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